

师道师说——全景展示大师的学术生活史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侯仁之
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侯馥兴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神道

神

中国书画院九秩导师文集

侯仁之
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侯馥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道师说·侯仁之卷 / 侯仁之 著；侯馥兴 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ISBN 978 -7 -5060 -5980 -0

I. ①师… II. ①侯… ②侯… III. ①侯仁之一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574 号

师道师说：侯仁之卷

(SHIDAO SHISHUO : HOU RENZHI JUAN)

作 者：侯仁之

编 者：侯馥兴

责任编辑：姬 利 张 龙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开 本：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23.25

字 数：272 千字

书 号：ISBN 978 -7 -5060 -5980 -0

定 价：42.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总序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 1984 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 1949 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 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 1949 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 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 年 3 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 1953 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 88 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华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 2010 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 年 12 月 1 日

总序二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用“三五之变”来讲天运变化，也可以用来比附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那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上下两个五十年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的大变革。在第一个五十年的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从“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阵痛，走向融合西方思想文化而从容探索建构中国式的思想文化范式的历程，造就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一批颇具哲学思想原创性的著作纷至展现，他们走出王国维的以西方哲学概念诠释中国哲学观念的困局。在历史考古学方面，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充实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纪传体叙事模式，以实证田野调查手段，让五千年古史鲜活起来。在文学领域，他们以人文主义融合了中国传统诗词歌赋的情感创造出新时代文学作品。在训诂考据文字学方面，他们用新的研究方法给这最具传统的领域增添绚丽色彩。总而言之，那三十年几乎在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诚如梁启超所言：“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可以说今天的学人如不能承继这份学术遗产的话，是无法迈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堂奥。

后五十年代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中国史上的巨变，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结束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其后三十年，曾经引导中国思想剧变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由学理向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毛泽东思想笼罩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在理论学术界，“左”倾教条主义得以大肆横行，政治批判取代了严肃的学理研究，所有学术话语都转换成意识形态斗争的语言。从而造成学术理论思想创见的贫乏，学术研究的发展由繁荣走向枯

稿。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除在古籍史料整理上有值得称道的成绩以外，在学术理论、学术方法方面的发展则乏善可陈。待到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思想学术研究放开，思想界也开始了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成因的文化反思，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再次如潮涌来，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译为中文，成为最时尚的读物，演为二十世纪的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此后又有多年的思想学术的低潮，不过那寂寞春夏还是孕育了学术思想的种子，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学术思想的成果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十世纪去了，中国文化书院的一部分导师也随之仙逝。他们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地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这套丛书选编了中国文化书院九十岁以上的导师的最具代表性著作和他们的亲友及学生对先生的追忆而集结成书。不为歌功颂德，只为记住我们自己的老师！当然我也企盼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土地上，也应有属于他们的一座纪念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为序。

后学王守常谨记
2011年12月22日深夜

目 录

| | |
|---------------------------------|----|
| 总序一 | 1 |
| 总序二 | 3 |
| 我的自述 | |
| 小 传 | 3 |
| 学业历程自述 | 13 |
|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 30 |
| 我从燕京大学来 | 39 |
| 学业成长自叙 | 51 |
| 我的家庭 | |
| 我的母亲 | 57 |
| 儿时的回忆 | 61 |
| 《宇宙之大》再版序 ——为纪念亡弟硕之作 | 67 |
| 师恩厚重 教泽流长 | |
| 读冰心师《我和北京》 | 77 |
| 怀念我的启蒙老师冰心 | 80 |
| 在弘扬中华文化的道路上 ——怀念我师洪业教授 | 81 |
| 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 ——再记我师洪业教授 | 86 |

| | |
|----------------------------|-----|
| 登高自卑，行远自迩 | |
| ——三记我师洪业教授 | 91 |
| 从日寇监狱到人间炼狱 | |
| ——四记我师洪业教授 | 94 |
| 师承小记 | |
| ——忆我师顾颉刚教授 | 104 |
| 山高水长何处寻 | |
| ——追忆颉刚师二三事 | 110 |
| 一次意外的收获 | |
| ——忆邓文如师 | 113 |
| 谊在师友之间 | |
| ——怀念梁思成教授 | 115 |
| 知我之深 期待之殷 | 119 |
| 抗日救国 颠危骇浪 乱离之世 因缘有自 | |
| “一二·九”这一天的回忆 | 125 |
| 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 | 128 |
| 永恒的怀念 | |
| ——忆陶军 | 149 |
| 忆洪业师 | |
| ——兼为“六君子歌”作注 | 151 |
| 《洪业传》读后感记 | 154 |
| 深情怀念金鼎同志 | 163 |
| 唯有书香传后人 | 169 |
| 殷忧启圣 大难兴邦 | 173 |
| 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说起 | 176 |
| 北京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 |
|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 181 |

| | |
|------------------------------|-----|
| 《故都胜迹辑略》前记附目录 | 189 |
| 狱中腹稿《北京都市地理》前言 | |
| ——《陆海古城》 | 191 |
| 北京是一座伟大美丽的城 | 193 |
|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 | 204 |
| 新中国建国之初，首都新定文教区的历史地理考察 | 207 |
| 要看到建设“滨河公园”的历史意义 | 213 |
| 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 | 216 |
|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 220 |
| 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 236 |

学海一棹

| | |
|------------------------|-----|
| 历史地理学刍议 | 249 |
| 《历史地理》创刊号发刊词 | 258 |
|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 261 |
|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序言 | 263 |
|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再版后记 | 267 |
| 《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序言 | 269 |
| 《环境变迁研究》发刊词 | 273 |
| 《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前言 | 276 |
| 徐霞客 | |
| ——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 | 279 |
| 万里长城 | 287 |

守望燕园

| | |
|----------------|-----|
| 在燕园里成长 | 295 |
| 燕园里有一座丰碑 | 297 |
| 未名湖上新景象 | 299 |
| 未名湖溯源 | 302 |

| | |
|---------------------|-----|
| 为保存顾颉刚故居致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信 | 316 |
| 北京大学校园本部在规划建设上的继往开来 | 317 |
| 北京大学燕园校区在规划上的继往开来 | 331 |
| 我爱旅行 | 333 |
| 书缘 | 336 |
| 购《尼罗河》书题 | 340 |
| 老牛自知黄昏晚 | 342 |
| 重觅石渠记 | 344 |
| 《奋蹄集》序 | 350 |
| 编后语 | 353 |
| 总后记 | 357 |

我的自述



小 传

1911年12月6日我出生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刚被赶下宝座只有50天，其后又过了25天，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此我说自己出生在一个“隶属无主”的时代，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民”。

父亲侯天成（字佑忱）毕业于河北通州潞河书院后，携母亲刘毓兰从原籍山东恩县到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在镇上一所基督教会创办的抢才中学任教。我出生时母亲年近四十。父母久盼而得子，自是喜悦，为我取乳名“光临”，也就是光明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意思。更可喜的是，两年后，我有了个弟弟硕之，乳名“重临”，意即光明再次来临。我们兄弟二人自幼同生共长，手足情深。硕之聪慧早熟，如与我同年。在母亲独出心裁的教养下，我们养成喜爱读书、爱惜书籍和勤俭劳动的习惯，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

我年幼体弱多病。小学毕业后，进入抢才中学一年级，连续两年因病辍学。在一位远房堂兄的建议下，转往他任教的山东德州博文中学就学。堂兄毕业于东吴大学体育系，他指导我从缓慢跑步开始，有计划坚持锻炼。我按照去做，晚自习后在操场刻苦练习长跑，坚持下来果然有效。升入博文高中后，居然能被选为山东代表队成员参加华北田径运动会。在决赛中虽然未能取得名次，可是我已养成了长跑习惯。我进入燕京大学之后也未尝间断长跑，所创5000米越野跑的校记录保持了近二十年，一直到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以后的1954年才被打破。正是由于长跑锻炼的结果，使我在日后的野外考察中体力充沛、乐而忘返。

对我们兄弟二人的幼年教育，母亲比父亲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和劳力。母亲没有上过学，在外祖父亲自教育下自学而成。她很会讲故事，

曾把《旧约圣经》中的“基甸救国”故事通俗化了讲给我们听，我很喜欢而且深受感动。母亲还很重视我和弟弟的写作练习。就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母亲因心脏病去世。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痛苦和悲凉。为寄托对母亲的思念，我利用整个暑假，沉浸在把“基甸救国”的故事创作成剧本的努力，其主题是：“被俘虏的终于得释放，被压迫的终于得自由。”父亲的一位朋友把剧本拿去，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鲁铎》半年刊第一卷第二期。这本刊物我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后来在多次被抄家中失掉了。

我为什么要用剧本的形式来写这个故事呢？这和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参加话剧《山河泪》演出有直接关系。那是一部描写爱国青年学生的话剧，演出也锻炼了我的语言能力。到了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我有勇气参加学校组织的讲演比赛，竟然得了第一名。消息传给母亲，她立刻写信来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母亲早就说过，如果我长大了当一名教师，她能坐在课堂的最后一排位子上听我讲课，就很高兴了。可是我再也没有料到，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过早离开了我。母亲的期待成为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引导我走上了一生执教的道路。我的教书生涯始于考入燕京大学后第一个学期的期末，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站在了燕大附属初中的讲台上。从那时起一直到念研究生，我在附中兼课前后延续了四、五年时间。

当我转学到博文中学校初中一年级时，偶然从同学那里借阅到他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哥哥寄来的一本新文学作品《超人》。其中一篇《离家的一年》深深触动了我——因为那也恰好是我离家的一年，从此引发了我热衷课外阅读和自己动笔写作的兴趣。数年之间涉猎过诸如文学研究社、创造社、太阳社等出版的大量刊物，补偿六年间正常学习的不足。《离家的一年》的作者正是后来以《寄小读者》这本书而深受广大青少年所敬爱的作家冰心。到了1931年初夏，高三年级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作为潞河中学的保送生提前到燕京大学参加国文、英文两科特别入学考试。在穆楼的考场，主持国文考试的一位年轻女老师走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两个题目：一个是“雪夜”，要求用白话文来写，另一个是“论

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要求用文言文来写。我自以为写来得心应手，就提早交了卷。顺利通过考试后，我获得四年奖学金，入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只是事后才知道这位主考老师，正是在广泛阅读中给我启蒙教育的冰心老师。自此，我就尊称冰心师为我的“启蒙老师”了。

就在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的 1929 年暑假，父亲决定要我转学到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因为那时有两位远房堂兄正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就读，父亲希望我将来也能学医。

来到齐鲁高中刚刚一个学期，因学潮突起，高中停办，我又转回博文高中。记得时任校长王元信留美归来，创办《博文季刊》，我被选为主编。我还根据课余涉猎所及加以综述，写了甘地在印度领导的反英运动的文章，以“从欧战后印度民族的自治运动说到独立运动”为题发表。我手中所存的该刊一、二期，同样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丢失了。

由于当时博文中学尚未在政府立案，学生不能直接报考大学。为升学计，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到河北通州潞河中学。该校的前身是美国教会所办的协和大学，也正是我父亲的母校，自然得到他的支持。那是 1931 年秋，我第一次来到想往已久的历史文化古城北京，从此与北京结下不解之缘。

可是我到潞河中学不过半个多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袭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立即激起广大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学校的同学发起抗日宣传活动，我参加抗日演讲，又开始校内军训。但是掀起的学生运动到年底时就被政府压制下去了。国难当头，抗日也不允许，我非常苦闷。寒假中我有家难归，一个人从潞河徒步四十里路到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为取一本我预订的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回去的路上边走边读。1931 年 1 月号这一期辟有《贡献给今日青年》专栏，其中的一篇写得特别好，鼓舞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文章的作者是顾颉刚。我本来对学医就没兴趣，受顾颉刚文章和潞河中学陈昌佑校长的影响，更想选择学历史。最终促成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硕之。他说：“我主张

你学历史。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这样我报考了顾颉刚教授所在的燕京大学。

我在燕京大学本科四年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同时还得到博文强记贯通古今的邓之诚（文如）教授的及时指点，也使我深受教益。在课外参考书阅读中，我又开始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

在本科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后，我应新任历史系主任的颉刚师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他创设了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指定我事先为学生写好参考资料，作为现场教学之用。我早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参考资料的写作进一步增加了我对北京古城的认识。可是这一学年刚结束，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相继沦陷，颉刚师被迫离校南下，我转为煨莲师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完成了《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论文。实际上这时我的学术思想已经向着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为此煨莲师为我安排了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的机会，只因欧战阻隔未能成行。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直到 1945 年 8 月日寇战败投降为止，前后十有四年。在这 14 年中的前 8 年，我先后从燕京大学本科与研究院获得文学士和文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1941 年 12 月燕京大学被日寇查封，我遭日本宪兵逮捕。以罪名“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被日本军事法庭会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没有迁居旅行自由。出狱后流寓津门，先后任教于天津达仁商学院与天津工商学院。1945 年 8 月日寇战败投降，我立即回燕京大学参加复校工作。转年夏，我得按原定计划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三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回到了促使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北京城，直到今天。其间的经历可见于《学术历程自述》一文。